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 第一卷,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1.6
ISBN 7—200—04339—7

I. 中… II. 中… III. 中国共产党—党史—北京市 IV.
D23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35809 号

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

第一卷

ZHONGGUO GONGCHANDANG BEIJING LISHI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www. bph. com. cn](http://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外国语大学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32开本 22.75印张 515 000字

2001年6月第1版 200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200-04339-7
D·372 定价:(精)47.00元

本书编委会

主任：于均波

副主任：龙新民 李炳华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于均波 王 火 王修身

冯书亮 龙新民 张凤朝

李炳华 徐俊德 郭文杰

梅宁华

主 编：王修身

副主编：谢荫明 黄景山 赵 晋

目 录

第一章 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北京的传播	(1)
第一节 五四运动前的北京	(1)
辛亥革命与清王朝的覆灭.....	(1)
北洋军阀统治的建立.....	(3)
资本主义经济在北京的发展.....	(5)
初期新文化运动.....	(7)
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北京.....	(11)
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13)
北京学生爱国会的成立.....	(15)
第二节 五四运动在北京	(17)
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	(17)
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	(18)
爱国运动在北京的发展.....	(22)
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	(23)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在北京的传播	(26)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26)
“问题”与“主义”之争.....	(29)
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	(31)
第二章 北京共产党小组的创立	(34)
第一节 北京率先酝酿建党的活动	(34)
酝酿建党及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立	
.....	(34)

第一章

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北京的传播

第一节 五四运动前的北京

北京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北京是揭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序幕的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发祥地之一。在 20 世纪中国发生的三次历史性巨大变化中，北京都具有特殊的地位。

辛亥革命与清王朝的覆灭

北京作为元、明、清历代帝都，是中国长期封建统治的中心。1840 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后，西方列强靠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了中国的门户，进入了中国的内陆，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北京成了列强瞩目的中心。1860 年英法联军武装侵入北京城，1895 年日本以攻占北京为要挟，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包括割让台湾在内）的《马关条约》，1900 年八国联军再次武装占领北京，北京带着沉重的历史屈辱进入了 20 世纪。

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以及由这个主要矛盾所影响、衍生出来的各种矛盾，在北京都有集中的表现。封建主义的超经济剥削，帝国主义的残酷掠夺，各项不平等条约带来的

耻辱，激起北京各阶层人民包括统治集团内部一些有识之士的反抗和斗争。

在太平天国运动、百日变法维新、义和团运动相继失败之后，20世纪初，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国资产阶级逐渐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于1894年在美国檀香山成立兴中会，第一次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1905年他发起成立中国同盟会，完整地提出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标的政治纲领，在中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在以后几年间，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在全国各地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武装起义，也曾试图在北京发动“中央革命”。这些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在全国民众中逐渐扩大了革命的影响。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一个多月内，有15省宣布独立。消息传来，北京人民欢欣鼓舞，清王朝则惶惶不可终日。帝国主义各国看到清朝大势已去，也想换一个更得力的工具，因此，靠献媚外国和屠杀人民起家的袁世凯得以出任清朝内阁总理大臣。11月13日，袁世凯率大批卫队进入北京，掌握了军政大权。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2月12日，清朝皇帝宣布退位，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终于被推翻了。这是20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第一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它“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从而使中国社会前进了一大步。

辛亥革命的成功，令全国人民耳目为之一新，精神为之一振，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逐渐深入人心，民主主义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辛亥革命对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的巨大冲击，不仅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大解放，而且使在封建专制制度禁锢下的生产力得到了解放，为民族经济的发展创造了

必要的条件。

辛亥革命的强烈震荡，使中国的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但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实在太根深蒂固了，推翻和消灭它，绝不是一两次革命运动冲击所能完成的。

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还很薄弱，政治上也不成熟，提不出一个彻底的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因此，辛亥革命不可能使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和民族独立，更没有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革命尚未达到预期的目的。在帝国主义的干涉下，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被袁世凯所攫取。1912年2月14日，孙中山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同时迫使南京临时参议会同意迁都北京。北京成了北洋政府的统治中心，成为军阀、官僚、政客角逐的场所，在北京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一幕幕闹剧。与此同时，北京人民的反抗斗争在进一步发展，各种思想在激烈撞击，北京的先进分子在求索国家、民族的出路究竟在哪里。种种迹象表明，反动统治秩序已经无法保持。

北洋军阀统治的建立

袁世凯攫取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即组建了北洋派占主导地位的临时政府。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标志着北洋军阀统治的开始。当时这个政府还保留着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体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还掌握着教育、司法、农林等部的行政权和立法权。

随着国家政治中心北移，辛亥革命后新成立的各个政党本部纷纷迁入北京。1912年8月25日，中国同盟会与统一共和

党等联合改组为国民党，在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举行成立大会，孙中山莅会发表演说。同年12月上旬，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会选举开始，至1913年3月基本结束，国民党取得了多数席位。该党实际负责人宋教仁准备组阁时，被袁世凯派人刺杀身亡。同年10月6日，国会召开总统选举会，袁世凯派出军警“保卫”会场，还有千余军警身穿便服，自称“公民团”，将国会团团围住，迫使议员选袁世凯为总统。袁世凯一登上正式大总统的宝座，便于11月4日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1914年1月10日，又公然宣布停止全体国会议员职务，扼杀了民国第一届国会。

1914年5月1日，袁世凯废除《临时约法》，炮制了《中华民国约法》。这部袁记约法全篇贯穿着“定于一尊”的皇权思想，取消一切对总统权力的制约，完全否定了民国以来的民主主义精神。同日，袁世凯改组政府机构，撤销国务院，在总统府内设立相当于前清军机处的政事堂，把一切行政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政府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以解决中日“悬案”为名的二十一条无理要求，以换取日本帝国主义对他颠覆共和、恢复帝制的支持。“二十一条”丧权辱国，使中华民族的生存受到重大的威胁，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1915年夏秋，袁世凯独裁称帝活动日益嚣张。他指派亲信党羽制造舆论，收买各方，策动实行君主制的请愿风潮。一时间，北京出现了各种各样光怪陆离的请愿团。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称帝。但在全国反对帝制的讨袁怒潮中，袁世凯只做了83天的短命皇帝，就不得不于1916年3月23日明令取消帝制，恢复民国。

袁世凯恢复帝制覆亡后，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各地军阀纷起，割据一方，混战连年不绝，北京成为争夺的中心目标。

几经角逐，北京政府的实权落到皖系军阀段祺瑞手中。段祺瑞是个亲日派，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竟以国家主权为抵押，在1917年8月至1918年9月仅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内，向日本帝国主义借款5亿元，用于军费开支，并在1918年5月同日本秘密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等条约。

北洋军阀政府对人民的独裁统治，与清政府相比并不逊色，他们强化警政，扼杀进步舆论，大肆逮捕和滥杀无辜。1914年3月，军阀政府公布了《治安警察条例》，同年底公布了《出版法》，第二年4月又公布了《报纸条例》，其中规定：凡涉及“混淆政体”、“妨害治安”之内容，一概不准登载，违者重罚。一批革命派的报刊，包括一些富有正义感的改良派报刊都遭到查封，使北京的报刊由民国建立初期的100多种锐减至20多种。在袁世凯称帝前后，仅被其特务机关北京军政执法处非法刑讯和屠杀的民众就有数百人。军政执法处被称为“鬼门关”、“杀人场”。

北洋军阀政府卖国独裁的反动统治，给北京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激起北京人民进一步的反抗和斗争。1915年，北京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掀起了反对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和爱国储金运动。当时北京流传着很多反袁传单和歌谣，如“钟楼高，鼓楼矮，假充万岁袁世凯”、“铜子改老钱，铁杆打老袁……”等。1916年，北京人民为支援天津人民反对法国强占老西开地区的爱国义举，开展了抵制法币、法货斗争，北京中法银行几乎在挤兑下倒闭。

资本主义经济在北京的发展

随着帝国主义的经济入侵和“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在

我国沿海沿江港口城市和一些物产资源丰富的地区，出现了一批由外国资本家和中国封建官僚开办的近代资本主义企业和第一代中国产业工人。在北京地区，1879年开办的门头沟通兴煤矿，1883年开办的神机营机器局，20世纪初开办的长辛店机车修配厂和南口铁路工厂，以及北京丹凤火柴公司、京华印书局、京师华商电灯公司、清河溥利呢革公司、度支部印刷局、貽来牟和记面粉厂等，都采用了机械化的生产手段。到辛亥革命前，北京近代产业工人约有数千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时间北京地区双合盛啤酒厂、振兴制革厂及面粉、食品、造纸、织布、地毯等大小企业陆续开办，产业工人也迅速增加，到1919年已有2万人左右。北京的商业一度也有较快的发展。但在关税受帝国主义控制、大量洋货倾销下，北京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加上北洋军阀政府苛捐杂税的盘剥，军阀连年混战的摧残，大批工商企业纷纷破产。根据北京《市政通报》统计，自1917年10月至1918年5月的8个月的时间内，北京倒闭歇业的大小商号达2247家。城市贫民与日俱增，据外城内城20个区的调查，无米为炊、亟待救济的极贫户达15689户，计65434人。

这期间，近代金融业在北京也有所发展。至1919年，在北京已开设有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新华信托储蓄银行、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孚银行、中国农工银行、大陆银行等10余家官商合办和商办银行，还有花旗、麦加利等一些外商银行。这些银行多为军阀政府滥发钞票、公债和军阀、官僚操纵民生、投机取利服务，但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融通资金也起到一定作用。1918年，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所在北京创立，专做中外银行钞票交易，后又做公债交易，为政府销纳债券，

每日交易额达数百万元。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作为封建生产方式的对立物出现的，它所创造的社会生产力、组织的社会化大生产及发展的科学文化都是以往封建社会所没有过的。资本主义经济在北京的发展使新的阶级力量——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不可避免地成长着。经济基础和阶级力量的变动，孕育着社会变革的因素。这场社会变革是以思想活跃的知识界倡导的新文化运动为开端的。

初期新文化运动

辛亥革命的影响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北京作为文化古都，对于思想文化方面守旧与革新的变化尤其敏感。民国建立后，除原有的北京大学外，北京陆续办起一些较有影响的新式学校，如高等师范学校、清华学堂、协和医学院、燕京大学、工业专门学堂、医学专门学堂、京师法政大学堂、法律学堂、测绘学堂等等。1912年时，北京有中等学校20所，1916年发展到36所；1911年有小学156所，1916年发展到277所，1917年达到331所。这些学校逐渐采用较为先进的教学方法，传授科学知识。当时世界上的许多思想流派、治国方略、名人事迹也陆续在报刊上有所介绍。

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却没能能够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决定了它在思想文化上实行的革命也是不彻底的。辛亥革命后，北京的思想文化领域仍为封建主义所把持，鼓吹封建主义文化，宣扬神鬼迷信，反对科学，维护皇权，反对民主，反对共和的言论依然十分猖獗。这种状况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激进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认为，共和国度所以不能真正得到巩固，根本原因在于缺少一场对旧思想、

旧文化、旧礼教的彻底批判。作为对辛亥革命在思想上的一种补课，他们发动了一场猛烈的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次年9月出版第2卷第1期时改名《新青年》），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

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向青年们提出6点希望：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隐退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像的。他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第一次提出了“人权”和“科学”的口号，树起民主和科学的两面大旗。

1916年底，陈独秀随《新青年》编辑部由上海迁到北京，李大钊、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都参加到编辑部中来，并成为主要撰稿人。他们是初期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和领导人。

此时，在北京大学校园里，正进行着一场深刻的变革。在蔡元培校长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下，一批学有专长并具有浓厚民主主义思想的学者被请来执教，北京大学成了新文化运动的阵地。许多青年学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拥护者和参加者。除《新青年》外，当时北京积极提倡新文化、新思想的还有《每周评论》《国民》《新潮》《晨报》《京报》等报刊。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提倡民主和科学。“民主”是指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并要求仿效法兰西资产阶级革命，实现中国的共和。在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看来，“民主”在政治上体现为拥护共和政体，反对封建专制和军阀独裁，反

对为专制政治服务的封建旧伦理、旧道德；在思想上则体现为以独立、自由和平等为原则，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利，提倡个性解放、平等自由，使人成为自主、自由的人。它同封建专制没有调和的余地。

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科学”，主要是指自然科学，同时主张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传统观念和一切社会问题，反对迷信，反对偶像崇拜，宣传进化论、唯物论和无神论，提倡客观地看待事物，反对迷信、盲从和武断，树立起积极、进取和科学的精神，因而具有更广泛和更深刻的意义。

“民主”和“科学”的提出，切中当时中国社会和思想界的时弊。民主的对立物是专制，科学的对立物是迷信，这正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遗留的恶果。它们有着根深蒂固的势力和影响。向这两个大敌全面宣战，需要极大的勇气。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还很有见地地认识到“民主”与“科学”两者的关系。《青年杂志》创刊号明确主张“科学与人权并重”，强调用科学的精神反对宗教迷信和偶像崇拜，引导人们认清封建君主专制的反动与虚伪，以科学和理性来判断一切。

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要求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是新文化运动的又一个内容。当时的文坛，陈腐的封建文学占据着统治地位，成为传播新思想的严重障碍。因此，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在思想革命的同时，又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胡适写成《文学改良刍议》，认为“文学革命”需从八个方面入手，即：不用典，不用陈套语，不讲对仗，不避俚字俗语，须讲求文法之结构，不作无病之呻吟，不摹仿古人，须言之有物。

1917年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正式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主张“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

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这样就把提倡民主和科学的反封建斗争与反对文言文和八股文、进行文学革命结合起来，开辟了中国文学的新局面。

在创造新文学方面，将文学革命的内容和白话文形式结合得好的首推鲁迅。鲁迅以他特有的“呐喊”为新文化运动助长声威。1918年5月，鲁迅发表他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仁义道德”不过是“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罢了。这篇小说不仅是中国文学革命的里程碑，而且其思想的尖锐和文笔的犀利，在当时是无人可比的。他的其他小说《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把反对封建礼教的革命内容和白话文的新形式结合起来，树立了新文学的典范，为新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杂志联系了一大批进步的知识分子，成为领导这场运动的中心，被誉为“青年界之金针”和“良师益友”^①。创刊时发行数量只有1000册，1917年即增加到一万五六千册。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这次运动较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时期对封建主义的冲击更进了一步。新文化运动大力宣传民主和科学，对启迪民智，启发人们特别是青年的民主主义觉悟起了极大的作用。毛泽东同志曾经评价说：新文化运动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

^① 《通信》，《新青年》第2卷第5号。

了伟大的功劳”^①。

初期新文化运动也有主观主义、片面性和形式主义的偏向，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关系处理不当等，但它在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和迷信愚昧方面功不可没，并为随后开展的五四运动在思想文化上做了准备。

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北京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工人、农民和士兵，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标志着旧世界的崩溃和新的社会主义世界的建立，极大地鼓舞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

俄国革命后第三天，中国报纸就发表了“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的消息，称：“彼得格勒戍军与劳动社会已推倒克伦斯基政府。”^②北京民众也很快得到消息。11月11日，北京报纸报道：“极进党占据该城，拘捕临时政府之内阁成员。首领黎宁氏（即列宁）要求即行停战订和约云云”^③。又说：7日下午，兵士委员会开非常会议，会长托洛斯基宣告临时政府现已不存在，内阁成员半数已被捕。暂行之国会亦已解散。黎宁氏大受欢迎。

1917年12月，苏俄政府宣告废除沙皇俄国同其他国家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在外国的各种特权，表示了对被压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0页。

② 上海《民国日报》，1917年11月10日。

③ 《晨钟报》（北京），1917年11月11日。

迫民族的友好态度。接着，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在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宣布：“我们放弃沙皇政府在满洲的所有掠夺品，我们恢复中国在这些地区的主权。”“放弃在中国和内蒙古的治外法权的一切利益，撤销沙皇在各种不同的借口下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切重税负担；撤销帝俄时代所有留在驻华使馆中的武装部队”^①。1918年2月，中国国内报纸上刊登了苏维埃政府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消息，并表示赞许。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在北京社会，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十月革命使中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找到了学习和遵循的榜样，开始逐渐地抛弃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最高理想，努力学习俄国，探求民族解放的新出路。劳动群众把十月革命说成是俄国“穷人党”的胜利，满怀希冀地欢迎它。

十月革命使中国的知识分子看到了工农群众的伟大力量，产生了对劳动人民的新认识。1918年3月，中国第一次出现了以“劳动”命名的杂志。蔡元培在同年11月的演讲中喊出“劳工神圣”的口号，他认为“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②。李大钊指出：要彻底改变中国社会“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③。

对于十月革命的胜利，新文化运动中以胡适为代表的一翼采取旁观的态度，继续他的“协约国所以能大胜，全靠美国的帮助”^④的主张。军阀官僚视十月革命如洪水猛兽，不时地发

① 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2页。

② 蔡元培：《劳工神圣》，《新青年》第5卷第5号。

③ 李大钊：《青年与农村》，《晨报》，1919年2月20日。

④ 《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1月27日。

布严查“过激党”的禁令和通报，反映了他们的仇视和恐慌。

十月革命初期，由于对其情况了解和认识的不一，中国报章杂志上的消息和评论五花八门。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俄国革命局势的稳定，国内的舆论比较明确起来了。1918年4月出版的《劳动》杂志第1卷第2号上的一篇文章说：“现在我们中国的比邻俄国，已经光明正大地做起贫富一班齐的社会革命来了。社会革命四个字，人人以为可怕，其实不过是世界的自然趋势。现在社会不善的原因，以后处处皆要发现的，毫不稀奇。”

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十月革命使中国的先进分子认识并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曾形象地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①

中国最早歌颂十月革命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并能够较准确地分析十月革命的本质，阐述其伟大意义者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1913年至1916年李大钊留学日本期间，曾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学说。1917年春季，他研究了俄国二月革命经验及布尔什维克党在革命中的作用。十月革命后，他又积极向友人宣传和介绍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1918年7月，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指出俄国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它与18世纪法国革命相比，“时代之精神不同，革命之性质自异，故迥非可同日而语者”。“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①李大钊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了本质上的区分。

同年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他在文章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强盗的争夺战争。是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制止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战争。李大钊指出一切反动势力必然灭亡，而社会主义、布尔什维主义一定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他把俄国十月革命看做是“20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看做“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20世纪新潮流的胜利”，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他热情地欢呼：由今而后，到处所见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旗。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强调说，新纪元的创造是非常艰难的，但这种艰难是社会进化途中所必须经过的。对此我们不要恐惧，不要逃避。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必须经过一番苦痛，必须冒许多危险。这正如有了母亲诞孕的劳苦痛楚，才能有儿子的生命。他大声疾呼中国人民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的强盗世界，创建一个“有工大家作，有饭大家吃”的新世界。1919年元旦，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3号上发表了《新纪元》一文，指出：劳工阶级“有了武器在手，就要掉过头来，拥护劳工的权利”。“劳工阶级有了自卫的方法，那些少数掠夺劳工剩余的强盗，都该匿迹销声了”^②。

李大钊的这几篇文章，虽然还没有系统地介绍马克思的学

① 《李大钊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7—219页。

② 《李大钊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1页。